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吗

——基于“一带一路”数据的门槛效应研究

万晶，周记顺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 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 (OFDI) 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分析, 利用中国 2003—2017 年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数据探讨了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 两者之间呈倒 U 型非线性关系, 当 OFDI 强度小于门槛值时, OFDI 显著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提高, 相反则显著抑制; “一带一路”政策使两者之间倒 U 型关系更显著。在进一步区分 OFDI 所属地区和投资动机后, 发现我国东中部地区 OFDI、对沿线国家市场寻求型 OFDI 和技术寻求型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倒 U 型关系更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则表明, OFDI 通过正向就业效应和负向技术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检验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的门槛特征, 发现在就业门槛效应的条件下,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呈 U 型关系; 在技术门槛效应的条件下,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 且呈现边际递减的规律。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劳动收入份额; “一带一路”; 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 F7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034(2022)02-0087-18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00 万亿元, 稳居世界第二。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尽管我国劳动者报酬逐年递增, 但其每年增长速度明显低于 GDP 增长速度。

[收稿日期] 2021-07-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球价值链重塑与中国出口质量升级研究”(17BJL108)

[作者简介] 万晶 (1995—), 女, 湖北鄂州人,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环境贸易; 周记顺 (1979—), 男, 河南安阳人,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1992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8.7%，2011年下降到了45.5%，2018年又上升到了58.04%，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近年来，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下滑（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Ibarra和Ros，2019）。这与Kaldor（1961）提出的“卡尔多特征事实”——劳动收入份额会一直为恒常数相悖。随后，Bentolila和Saint-Paul（2003）利用美国与13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差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也要同步增长，在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国内劳动收入份额也要同步提高。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其背后的原因对于国民收入合理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部分学者认为，我国2004年改变劳动收入份额统计口径和核算方法的政策会高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程度（李扬和殷剑峰，2007；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也有学者表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国民消费能力，带来国内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潜在风险；也会增添政府保障负担，导致财政负担加重的问题；同时还会引起我国劳资冲突，导致国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Jayadev，2007；陈登科和陈诗一，2018），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随着我国2012年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和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迅猛增长。2003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简称沿线国家）OFDI存量仅为13.35亿美元，2019年迅速攀升至1794.7亿美元，较2003年增长了133倍。随着我国在沿线国家投资的增长，双方国际产能合作得到进一步加深，引起国内要素发生跨国流动，国民劳动收入份额随之产生变化。Feenstra和Hanson（1997）认为国际资本流动等经营活动会对国内的资本结构和生产要素流动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发生变化；Acemoglu（2003）也验证了国际资本流动会影响母国劳动收入分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2011年开始出现了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2018年增长到了58.04%，这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如图1所示^①）。因此从对外投资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规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理解开放经济背景下中国收入分配合理化的路径，也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和落实互利双赢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前国内外关于OFDI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微观层面。如Head和Ries（2002）、Cuyvers和Soeng（2011）从微观企业层面分别研究了日本和比利时跨国企业OFDI，发现OFDI会提高母公司非生产个人的工资份额，同时还发现母公司投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应的员工工资水平提升程度也会不同；另外有学者从微观行业和个体层面对OFDI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 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EB/OL].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512/20151201223578.s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探究, 得出了 OFDI 会促进高技能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和降低低技能工人工资水平的结论 (Hijzen 等, 2005; Geishecker 和 Görg, 2008)。少数研究从宏观层面探讨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如 Nilsson 等 (2014) 和 Kang (2014) 分别研究了瑞典、韩国 OFDI 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OFDI 会拉大母国收入差距, 导致收入分配不均衡。Huang 等 (2016) 发现, 在发展中国家, OFDI 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与国家地理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关。现有中国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企业层面, 缺乏对宏观层面的深入探讨。比如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4) 发现, 我国企业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关系; 其他学者发现, 企业 OFDI 提高了母公司员工工资水平, 且缩小了部门内员工工资差距 (阎虹戎和冼国明, 2017; 刘海云和石小霞, 2018)。目前学术界从宏观层面对我国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 仅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母国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等方面 (王玉泽和罗能生, 2019)。相较于微观层面, OFDI 宏观层面的数据更全面, 投资区域覆盖广。因此从宏观层面研究我国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 可以丰富现有以微观层面为主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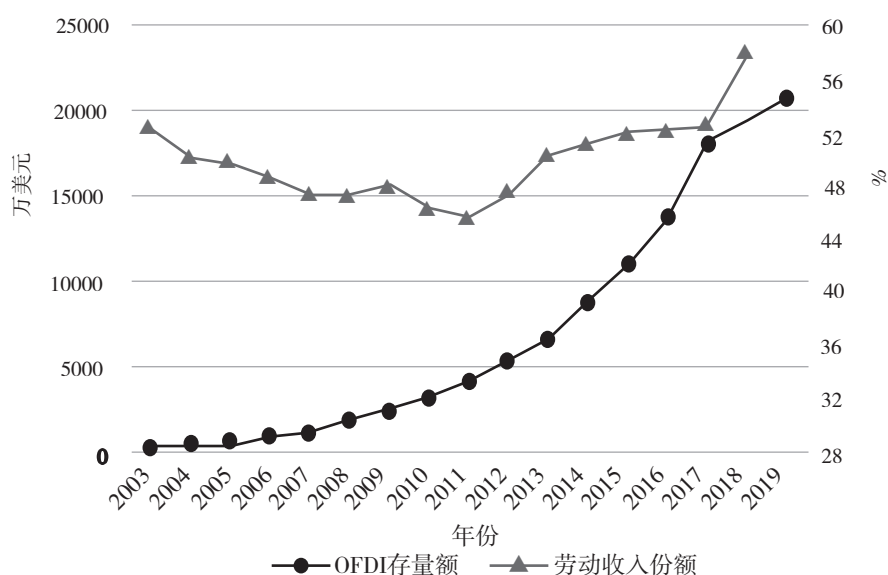


图1 2003—2019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OFDI存量额趋势图

基于此,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 第一, 鉴于当前国内外从宏观层面研究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关系的研究较少, 本文选取 2003—2017 年我国各省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数据, 从宏观层面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补充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第二, 本文基于 OFDI 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分析, 发现 OFDI 与母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当 OFDI 对母国就业的影响超过对母国技术的影响时, 劳动收入份额就会提高; 当 OFDI 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小于对母国技术的影响时, 劳动收入份额就会出现下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高涨的大背景下,有关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对母国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劳动收入份额迄今尚无定论。本文接下来将从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我国通过在东道国设立境外营销服务中心,从国内母公司进口商品到东道国进行销售,提高国外市场需求潜力,促进母国企业生产及生产投入要素的增加,从而对国内劳动力雇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李磊等,2016);此外,通过跨国并购实地考察东道国消费者需求偏好,了解其竞争优势产业,集中生产要素提高生产力,同时解决了东道国和母国部分就业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就业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影响国内要素投入和扩大国外需求促进母国就业增加。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公式可知,劳动收入总额等于人均工资与就业量的乘积,母国充分就业可以提高我国劳动收入总额,进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即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就业效应为正。另外,我国通过与沿线国家进行优势科技创新合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研发独立的新型适宜技术,利用东道国特殊劳动技能分享,投资其竞争优势产业,在扩大国际投资市场的同时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周记顺和万晶,2020)。在高收入国家建立子公司,通过更大的外部市场需求分摊母国研发成本,使得母国有更多精力投入高新技术研发环节,直接促进我国产生技术进步效应(李梅和柳士昌,2012),通过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我国企业内部员工技能结构优化。一旦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趋于稳定,国内收入分配就会向资本要素倾斜,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就会出现下降的变动趋势,即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技术效应为负。

由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被消化和吸收需要一段时间,在对外直接投资初期,技术效应要明显低于 OFDI 带来的就业效应,因此,最初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正;随着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逐步趋于稳定化,我国企业员工技能结构的优化也会相应地趋于稳定,收入分配又开始向资本要素倾斜,又会给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带来负向影响。故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1 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存在倒“U”型关系;

假说 2 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通过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其中就业效应为正,技术效应为负。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主要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目的大多为在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弥补母国要素市场资源短缺,寻求东道国先进高新技术以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等(Dunning JH, 1977),不同投资动机类型 OFDI 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理存在较大差异。

市场寻求型 OFDI 是以维持现有市场或者开拓海外新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主要

包括商贸服务型投资和生产型投资两种类型(史恩义和张瀚文, 2018)。其中商贸服务型投资通过在东道国设立境外营销服务中心, 更好地掌握消费市场需求和刺激境外消费来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 而生产型投资通过在东道国建立海外子公司替代国内生产出口, 实地考察东道国消费者需求偏好, 了解其竞争优势产业, 利用东道国稀缺特有资源集中生产要素从而提高生产力。无论哪种情况, 母国都可以从东道国获得更大的外部市场需求分摊母国研发成本, 从而促进国内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关于资源寻求型 OFDI, 这是以寻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 改善母国相关行业生产效率为目标的投资。通过获取海外自然资源解决要素市场资源短缺、利用海外廉价劳动力降低要素市场成本来提高国内劳动收入份额(贾妮莎和雷宏振, 2017), 但从世界劳工组织公布的各国劳动成本和劳动效率数据可知, 虽然我国人口红利近年来逐渐消失, 但劳动成本仍旧低于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 因此资源寻求型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最终影响并不确定。关于技术寻求型 OFDI, 主要是以通过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先进国家技术经验、人力资源和研发能力为目标的投资。通过投资东道国竞争优势产业、与东道国进行优势科技创新合作以及分享其特殊劳动技能等渠道可以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以及母国产品竞争力, 在促进产出需求的同时提升了母国就业和劳动收入份额; 此外, 技术寻求型 OFDI 的“学习效应”能够促进母国高端劳动力需求的提升, 通过提高劳动薪资吸引高端人才, 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李磊等, 2016)。故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3:

假说 3 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寻求型 OFDI 和技术寻求型 OFDI 会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而资源寻求型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增加的促进作用并不确定。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处理

(一) 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选取我国 2003—2017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 33 个国家^①(13 个高收入国家和 20 个中低收入国家) OFDI 数据, 探讨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关系。模型设定为:

$$LIS_{it} = C + \alpha_1 SOFDI_{it} + \alpha_2 SOFDI_{it}^2 + \sum_{z=1}^n \beta_z X_{zit} + \mu_t + \lambd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LIS_{it} = C + \mu_1 SOFDI_{it} + \mu_2 SOFDI_{it}^2 + \sum_{z=1}^n \beta_z X_{zit} + \sum_{m=1}^2 \gamma_m SOFDI_{it} \times W_{it} + \mu_t + \lambd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LIS_{it} 表示我国各省份 2003—2017 年劳动收入份额, $SOFDI_{it}$ 为我国各省份

^①20 个中低收入国家包括: 蒙古国、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马来西亚、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埃及、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印度、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 13 个高收入国家包括: 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捷克、新加坡、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波兰。

2003—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强度, n 为控制变量的个数, X_{it} 代表控制变量组, 包括要素投入比 (K/L)、资本产出比 (K/Y)、对外开放程度 (OP) 及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SD) 等, W 为影响机制变量, 包括就业占比 (LL_{it}) 和全要素生产率 (TFP_{it}) 等, μ_i 和 λ_i 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为模型误差项。其中, 用模型 (1) 来检验 OFDI 与带动收入份额间的非线性关系, 用模型 (2) 来分析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

(二) 变量处理

1. 核心变量

(1) 劳动收入份额 LIS_{it} : 表示所有要素投入生产时所获得的劳动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国家统计局对 2004 年及之后每年的个体经济劳动报酬核算方法进行了更改, 具体修改规定为: 2004 年前, “个体劳动者通过生产经营获得的纯收入, 全部视为劳动者报酬, 包括个人所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① 2004 年后, “对个体经济来说, 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 这两部分视为营业利润, 而劳动者报酬仅包括个体经济中的雇员报酬。”^② 故其测算方法一直存在着众多争议 (白重恩和钱震杰, 2009)。目前大部分学者认可的方式有两种: 一是 2004 年前的劳动收入份额用劳动者报酬与 GDP 的比值 (LI_{it}/Y_{it}) 表示;

2004 年及之后的劳动收入份额计算公式为: $LIS_{it} = \frac{LI_{it} \times Y_{it}}{Y_{it} \times (L_{it} - LP_{it})}$, 本文对用这种计算方式测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数值做基准检验; 二是 2004 年前的劳动收入份额计算公式为: $LIS_{it} = LI_{it}/(Y_{it} - T_{it})$, 2004 年及之后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方式为:

$LIS_{it} = \frac{LI_{it} \times L_{it}}{(Y_{it} - T_{it}) \times (L_{it} - LP_{it})}$, 本文对用此方式测算出的劳动收入份额数值做稳健性检验。其中 L 为我国各省份 2003—2017 年的实际劳动者报酬, Y_{it} 和 T_{it} 分别指的是我国 i 省份 t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生产税净额。另外, L_{it} 和 LP_{it} 则分别表示我国 i 省份 t 年的总就业人数和我国个体经济总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③ 等。

(2) 对外直接投资强度 $SOFDI_{it}$: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或流量的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重视程度, 因此本文选择 OFDI 强度作为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 但我国各省份 2003—2017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强度的数据不能直接获取, 需要通过计算才可以得到。

$$OFDI'_{it} = (OFDI_{it}/OFDI_t)ROFDI_t \quad (3)$$

$$ROFDI_t = \sum_j^n (OFDI_{jt}/GDP_{jt})S_{jt} \quad (4)$$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2002) [EB/OL]. http://www.stats.gov.cn/ztjc/tjzdgg/hsyjh1/yjhxslh/qt/201010/t20101013_69208.html.

②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经济普查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2004)》,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版。

在式(3)和式(4)中, $OFDI_j$ 是 t 年我国对沿线 j 国 OFDI 存量; GDP_j 为 t 年 j 国国内生产总值; S_j 为 t 年 j 国研发资本存量, 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为: $S_j = (1 - \sigma)S_{j(t-1)} + RD_j$, 其中 σ 是我国研发资本存量折旧率, 取 7.14%, RD_{jt} 为 j 国 t 期的实际研发支出, 基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为: $S_{j2002}^d = RD_{j2002}/(g + \sigma)$, 式中 g 是研发支出的年均增长率; $ROFDI_t$ 是 t 年我国对沿线 33 个国家 OFDI 所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和; $OFDI_{it}$ 为我国 i 省份 t 年非金融类 OFDI 存量,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OFDI_t$ 则是通过将我国 31 个省份 t 年对应的 OFDI 存量相加获得; $OFDI'_{it}$ 表示我国 i 省份 t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存量总额。对外直接投资强度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SOFDI_{it} = OFDI'_{it}/GDP_{it}$ 。

2. 控制变量

(1) 要素投入比 K_{it}/L_{it} : 用来表示我国各省份资本密集度。一般认为资本劳动投入比越大资本收入份额越大, 对应的劳动收入份额越小, 其中劳动 L 用总就业人数表示, 而资本存量 K 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获得。

(2) 资本产出比 K_{it}/Y_{it} : 为资本回报率的倒数, 资本回报率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小, 故资本产出比越大, 劳动收入份额就越大。

(3) 国内研发资本强度 SD_{it} : 可用我国 i 省份 2003—2017 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与对应地区 GDP 比值表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可以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 $SD_{it}^d = (1 - \sigma)S_{it(t-1)}^d + RD_{it}$ 。其中 σ 取值 7.14%, RD_{it} 为我国各省份 2003—2017 年以 2002 年为基年的实际研发支出, 基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为: $S_{i2002}^d = RD_{i2002}/(g + \sigma)$, g 同上。

(4) 对外开放程度 OP_{it} : 用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外贸依存度表示, 即用我国各省份 2003—2017 年的进出口总贸易额除以各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得到, 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 影响机制变量

(1) 就业占比 LL_{it} : 用我国 2003—2017 年每年各省份总就业人数与该年 31 个省份总就业人数的比值表示,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就业效应 ($SOFDILL$): 用对外直接投资强度与就业占比的乘积表示,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 全要素生产率 TFP_{it} :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有: $TFP_{it} = Y_{it}/(K_{it}^\alpha \times L_{it}^\beta)$ 。假设该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和希克斯中性, 资本存量 K 和劳动力 L 对应的产出弹性 α 和 β 满足 $\alpha + \beta = 1$ 。考虑到时间效应和政策影响, 引入时间趋势项和虚拟变量, 模型设定为: $\ln(Y_{it}/L_{it}) = \ln TFP + \alpha \ln(K_{it}/L_{it}) + cT + dD_j + v_{it}$ 。其中, D_j 表示我国 2012 年《“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虚拟变量, 产出 Y 为以 2002 年为基年的实际 GDP , 劳动力 L 用就业总人数表示; 资本存量 K 用永续盘存法测算, 最终可得 $\alpha = 0.42$ ($t = 21.11, p < 0.01$), 代入 $TFP_{it} = Y_{it}/(K_{it}^\alpha \times L_{it}^\beta)$ 中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效应 ($SOFDITFP$) 则用对外直接投资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表示。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变量含义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IS_{it} (基准)	劳动收入份额基准值	465	0.513 8	0.078 7	0.321 7	0.757 6
LIS_{it} (稳健)	劳动收入份额稳健值	465	0.602 9	0.088 6	0.387 6	0.830 7
$SOFDI_{it}$	对外直接投资强度	465	0.023 6	0.042 1	0.000 3	0.361 7
KL_{it}	要素比对数值	465	2.397 5	0.815 7	0.297 8	4.559 1
KY_{it}	资本产出比对数值	465	1.132 4	0.343 5	0.382 0	2.326 0
SD_{it}	国内研发资本强度	465	0.026 7	0.029 8	0.003 1	0.235 1
OP_{it}	对外开放程度	465	0.303 4	0.355 8	0.011 6	1.711 4
LL_{it}	就业占比	465	0.035 5	0.025 0	0.002 0	0.127 7
TFP_{it}	全要素生产率	465	3.904 8	0.275 5	3.238 3	4.662 7

(三) 数据说明

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从2003年才开始记录,目前更新到了2019年,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8年和2019年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故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3—2017年。研究样本涉及到我国31个省份^①。此外本文选取了3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一带一路”官网上记录的64个沿线国家中去掉了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国家,且采用插值法处理个别缺失数据)。

三、O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我国2003—2017年31个省份对应的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和F检验来设定最终模型,然后采用改变核心变量测算方法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实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一) 基准回归

表2中第(2)列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结论具有稳健性。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2017年OFDI并购项目有1/6是针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的,并购项目总额中“一带一路”项目占到了13.6%,OFDI的方式主要为跨国并购,解决了东道国和我国的部分就业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就业效应,劳动收入份额呈现上升趋势。同时由于我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类似,因此我国虽然不能更好地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但是可以通过与沿线国家进行优势科技创新合作和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研发独立的新型适宜技术来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使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能力得以提高,国内企业内部员工技能结构得以优化,劳动收入份额则会出现下降的变动趋势。但由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

^①本文关于东中西部的划分是政策上的划分,东部指的是最早实行沿海开放政策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中部指的是经济次发达地区,西部指的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东部地区:北京、河北、上海、广东、天津、江苏、福建、浙江、山东、海南和辽宁;中部地区:黑龙江、山西、江西、吉林、安徽、湖北、河南和湖南;西部地区:陕西、内蒙古、重庆、广西、云南、四川、宁夏、贵州、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

表2 全国层面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IS 的第一种测算方法			LIS 的第二种测算方法		
	(1)	(2)	(3)	(4)	(5)	(6)
$SOFDI_{it}$	0.160** (0.063)	0.677* (0.156)	1.178* (0.179)	0.137** (0.083)	0.746* (0.199)	1.546* (0.195)
$SOFDI_{it}^2$	—	-1.832* (0.507)	-3.191* (0.551)	—	-2.100* (0.625)	-4.220* (0.642)
KL_{it}	0.010 (0.009)	0.003 (0.009)	-0.019* (0.007)	0.033 (0.013)	-0.028* (0.014)	-0.021* (0.008)
KY_{it}	0.105* (0.021)	0.105* (0.022)	0.109* (0.016)	0.079* (0.031)	0.074** (0.031)	0.119* (0.018)
SD_{it}	0.077 (0.176)	0.114* (0.175)	0.400* (0.090)	0.324 (0.261)	0.386 (0.259)	0.392* (0.097)
OP_{it}	-0.098* (0.017)	-0.095* (0.017)	-0.051* (0.010)	-0.138* (0.025)	-0.128* (0.026)	-0.059* (0.011)
R ²	0.581	0.692	0.523	0.567	0.679	0.535
F 检验	—	—	68.590*	112.590*	97.970*	76.510*
Hausman 检验	52.790 [0.522]	9.800 [0.133]	—	37.570 [0.004]	15.470 [0.017]	—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小括号内为t值，中括号内为P值。下表同。

应被吸收和消化需要一段时间，在对外直接投资初期，O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正，随着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逐步趋于稳定化，O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又为负。故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为倒U型非线性关系，符合研究假说1。

再看表2中的控制变量，可以观察到 K/L 会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比较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由于要素投入比衡量的是我国各省份资本密集度， K/L 越大，说明该省份对应的资本密集度越高，而劳动收入份额就会越低。资本产出比 K/Y 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于资本产出比的倒数 Y/K 代表的是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越高说明对应的资本收入份额越高，而与之对应的劳动收入份额则相对较低，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回报率成反比，与资本产出比成正比，结论具有稳健性。除此之外，从表2中还可以发现，国内研发资本强度 SD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在拥有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时就会增加对高新技术人才的需求，而每年高新技术人才的数量有限，这就导致人才供不应求，工资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上涨，同时公司员工也会开始增强提高自身工作技能的意识，间接促进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另外由于一国在贸易开放时会出口大量国内的比较优势产品，进口国外的比较优势产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劳动密集型国家居多，我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对外贸易会促使我国出口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到沿线国家，而同时从沿线国家进口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贸易开放会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下降的变动趋势。

(二) 异质性检验

1. 政策效应检验

在原模型基础上加入政策时间虚拟变量 $year_t$, 检验“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前后我国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差异性。将 2013 年及之后定义为“1”, 2013 年前定义为“0”。根据表 3 中检验结果可知, 我国 2013 年实施的“一带一路”政策使得我国对沿线国家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倒 U 型非线性效应更明显, 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考虑到内生性和异方差的影响, 继续使用 2SLS 和 GMM 方法做了进一步研究, 结论证实了“一带一路”政策的促进效应。为了使得该异质性检验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继续将 2003—2017 年的全样本分成了 2003—2012 年和 2013—2017 年两组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检验结果表明我国 2003—2012 年和 2013—2017 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均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倒 U 型非线性影响, 且“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两者间的关系更加显著^①。可能的解释为: 自“一带一路”倡议

表 3 “一带一路”政策效应检验结果

项目	LIS 的第一种测算方法				LIS 的第二种测算方法			
	(1)	(2)	(3)	(4)	(5)	(6)	(7)	(8)
	OLS	FE	2SLS	GMM	OLS	FE	2SLS	GMM
$SOFDI_{it}$	1.714 * (0.491)	1.032 ** (0.448)	2.524 ** (1.269)	2.524 ** (1.269)	2.723 * (0.546)	1.537 * (0.543)	3.623 ** (1.411)	3.623 ** (1.411)
$SOFDI_{it}^2$	-7.703 *** (3.990)	-6.136 (4.309)	-16.670 (10.742)	-16.670 (10.742)	-12.166 * (4.406)	-7.266 (5.220)	-22.129 *** (12.035)	-22.129 *** (12.035)
$SOFDI_{it} \times year_t$	-0.996 *** (0.538)	-0.562 ** (0.430)	-1.089 *** (1.373)	-1.089 ** (1.373)	-1.929 * (0.587)	-1.067 ** (0.520)	-2.033 *** (1.531)	-2.033 *** (1.531)
$(SOFDI_{it} \times year_t)^2$	5.795 ** (4.060)	4.803 * (4.276)	13.984 *** (10.886)	13.984 (10.886)	10.144 ** (4.469)	5.943 * (5.180)	19.242 *** (12.201)	19.242 (12.201)
$year_t$	0.053 * (0.014)	0.029 * (0.010)	0.014 (0.036)	0.014 (0.036)	0.079 * (0.015)	0.045 * (0.012)	0.036 (0.039)	0.036 (0.039)
$_cons$	0.457 * (0.011)	0.417 * (0.015)	0.084 (0.068)	0.084 (0.068)	0.542 * (0.013)	0.499 * (0.019)	0.127 (0.080)	0.127 (0.08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	—	85.970 *	85.970 *	—	—	86.770 *	86.770 *
F 检验	55.060 *	72.300 *	—	—	70.880 *	69.190 *	—	—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①因篇幅所限, 相关资料备索。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刊文补充数据查询”栏目查询、下载。

提出后,我国更加重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某些传统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促使我国对其直接投资迅猛增长。我国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对沿线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加强了就业效应;同时我国又通过与沿线国家进行优势科技创新合作、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研发独立的新型适宜技术来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加强了技术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2. 地区差异性检验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所导致的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差异性,将我国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分别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①:不管是我国东部还是中部地区,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对该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均显著为倒 U 型非线性关系,结论具有稳健性;而我国西部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为:我国东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较西部地区迅速,城市化水平较高,政府对科研创新行业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西部地区,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偏多,有能力参与 OFDI 的企业相对于西部地区更多,进而导致我国东中部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反馈回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企业内部员工技能提高的速度比西部地区更快,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也会更加显著。而我国西部地区不管是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还是科研技术投入等方面都不如东中部地区,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同时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缺乏有能力的优质企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较少,企业内部员工工作技能提高的速度比不上东中部地区,从而导致我国西部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3. 投资动机差异性检验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不同类型国家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技术比较优势均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动机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根据国际常用的沿线国家资源禀赋相关指标及数据的可得性将 OFDI 动机分成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三类进行异质性分析,检验结果表明^②:我国对沿线国家市场寻求型 OFDI 与技术寻求型 OFDI 均显著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而资源寻求型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较弱。此外,不管是市场寻求型 OFDI、资源寻求型 OFDI 还是技术寻求型 OFDI,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均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倒 U 型非线性关系,其中市场寻求型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倒 U 型关系最为显著,资源寻求型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倒 U 型关系最弱。不仅如此,考虑到内生性和异方差,分别采用 2SLS 和 GMM 方法做了进一步的验证,证实了该结论的稳健性。

(三) 影响机制检验

由理论模型推导可知,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受到技术效应和就业效应

^①因篇幅所限,相关资料备索。

^②因篇幅所限,相关资料备索。

的共同作用。从表4中观察到OFDI强度与就业交互项的系数始终为正,而OFDI强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始终为负,可以得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可以通过直接影响母国就业以及技术水平来影响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且就业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正,母国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结论具有稳健性,且符合研究假说2。可能的解释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类型国家的OFDI动机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原因是通过OFDI促进国内要素发生转移,在提高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促进国内要素收入分配发生变化。就投资方式而言,一种是绿地投资,另外一种为跨国并购,跨国并购是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最直接和最高效的途径,我国通过在沿线国家新建工厂,解决了东道国和我国的部分就业问题,存在一定的就业效应。

表4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机制检验

项目	LIS 的第一种测算方法			LIS 的第二种测算方法		
	(1)	(2)	(3)	(4)	(5)	(6)
	RE	RE	OLS	FE	RE	OLS
$SOFDI_{it}LL_{it}$	3.763** (1.678)	2.806* (1.696)	5.886* (1.728)	1.949** (2.092)	1.995*** (2.061)	5.362* (1.993)
$SOFDI_{it}TFP_{it}$	-0.377** (0.189)	-0.102*** (0.252)	-0.215** (0.274)	-0.423* (0.237)	-0.248** (0.304)	-0.020 (0.315)
_cons	0.403* (0.016)	0.398* (0.016)	0.438* (0.011)	0.474* (0.019)	0.473* (0.018)	0.516* (0.01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587	0.694	0.523	0.571	0.579	0.653
F 检验	—	—	69.080*	81.300*	97.970*	77.610*
Hausman 检验	6.690 [0.462]	7.040 [0.532]	—	16.870 [0.018]	10.860 [0.145]	—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65	465	465	465	465	465

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与高新技术沿线国家进行优势科技创新合作,通过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研发,利用高收入沿线国家先进技术水平优势降低我国独立研发风险,利用各国优势共同研发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新型适宜技术,在扩大我国国际投资市场的同时,也能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技术进步。进行这类OFDI的主要是我国具有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大型跨国公司,OFDI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公司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首先通过东道国的子公司反馈回母公司,通过人员流动和企业内部交流被完全吸收并传播,再通过行业间交流向同行业或其他行业流动,在这个传递过程中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应的资本收益增长幅度更快,此时企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内部产出增长率高于劳动力工资增长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就会导致该企业劳动力收入份额出现下降,即技术效应

对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比重存在负面影响。当这种影响拓展到整个行业、整个国家层面，即国内产出增长率高于国内劳动力工资增长率时，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幅度更大。即技术效应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存在负面影响。

(四) 门槛效应回归

1. 门槛效应检验

由于我国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非线性影响主要是技术效应和就业效应的共同作用，且在不同阈值内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接下来以 OFDI 的技术效应 (*SOFDITFP*) 和就业效应 (*SOFDILL*) 两个方面作为门槛变量，采用 Hansen (1999) 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做进一步分析，并对门槛值进行测算。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LIS_{it} = C + \lambda_1 SOFDI_{it} \times I(q_{it} \leq \gamma_1) + \lambda_2 SOFDI_{it} \times I(q_{it} > \gamma_1) +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q_{it}* 为门槛变量，分别用技术效应和就业效应表示； γ 为未知的门槛值；当 $q_{it} \leq \gamma_1$ 时，*SOFDI_{it}* 的系数为 λ_1 ， $q_{it} > \gamma_1$ 时，*SOFDI_{it}* 的系数为 λ_2 ；控制变量的选取同上。从表 5 的单一门槛、双重门槛的门槛个数检验结果可知，技术效应 (*SOFDITFP*) 和就业效应 (*SOFDILL*) 只有单一门槛显著，因此本文对这两个变量统一采用单一门槛回归模型。表 6 为门槛估计值以及 95% 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技术效应和就业效应的门槛值分别为 0.000 1 和 0.001 4，且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无偏且有效。

表 5 门槛存在性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数	F 值	P 值	临界值			
				10%	5%	1%	
<i>SOFDILL</i>	单一门槛	15.240 0***	0.086 7	300	22.263 5	17.568 5	14.648 6
	双重门槛	8.950 0	0.313 3	300	24.132 6	16.035 8	8.950 0
<i>SOFDITFP</i>	单一门槛	31.490 0***	0.056 7	300	45.500 1	36.411 8	29.280 9
	双重门槛	15.040 0	0.320 0	300	43.545 9	34.010 1	25.912 5

表 6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门槛变量	门槛数	估计值	置信区间
<i>SOFDILL</i>	单一门槛	0.000 1	[0.000 1, 0.000 2]
<i>SOFDITFP</i>	单一门槛	0.001 4	[0.001 3, 0.001 4]

2.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以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为门槛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分析如下。

(1) 就业效应。根据门槛值可将就业效应水平分成高就业效应水平 (*SOFDILL* > 0.000 1) 和低就业效应水平 (*SOFDILL* ≤ 0.000 1)。当就业效应水平较低时，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说明在第一门槛区间内，OFDI 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当就业效应水平较高时，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在第二门槛区

间内，OFDI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在就业效应门槛约束下，O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现出U型非线性关系，只有就业效应水平达到一定的门槛值，OFDI才能显著地促进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可能的解释为：良好的就业效应水平会促使我国原本过剩的劳动力达到充分就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OFDI的前期就业效应并不显著，当企业“走出去”获取市场、资源和先进技术的意愿逐渐增强时，OFDI的就业效应就会随之增强，扭转了O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利影响。

表7 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

门槛变量	<i>SOFDILL</i>	<i>SOFDITFP</i>
门槛值	0.000 1	0.001 4
KL_{it}	0.037* (2.75)	0.044* (3.21)
KY_{it}	0.074** (2.37)	0.068** (2.17)
SD_{it}	0.483*** (1.85)	0.225 (0.87)
OP_{it}	-0.142* (-5.56)	-0.132* (-5.15)
$SOFDI_{it} \times I(q_{it} \leq \gamma_1)$	-4.990* (-3.70)	27.077* (3.35)
$SOFDI_{it} \times I(q_{it} > \gamma_1)$	0.099*** (1.20)	0.108*** (1.21)
常数项	0.462* (27.05)	0.450* (25.78)

(2) 技术效应。根据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可将技术效应水平分成高技术效应水平 ($SOFDITFP > 0.0014$) 和低技术效应水平 ($SOFDITFP \leq 0.0014$)。当技术效应水平较低时，O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在第一门槛区间内，OFDI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当技术效应水平较高时，O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在第二门槛区间内，OFDI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综上所述，在技术效应门槛约束下，O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显著的促进关系，当技术效应水平达到一定的门槛值时，O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变小。可能的解释为：技术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大型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以弥补母国技术创新，通过母公司人员流动和企业内部交流提高技术吸收能力，从而促进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这个吸收传递的过程中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应的资本收益增长幅度更快，此时企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企业内部产出增长率高于劳动力工资增长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就会导致该企业劳动力收入份额出现下降，即技术效应越高，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比重就会增长得越慢。

在前文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强度 (*SOFDI*) 为门槛变量，

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我国对沿线国家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倒 U 型非线性关系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门槛值。由表 8 的估计结果可知, 对外直接投资强度等于 0.051 376 为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倒 U 型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即当对外直接投资强度小于门槛值 (0.051 376) 时, 我国对沿线国家 OFDI 显著地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相反, 当对外直接投资强度大于门槛值 (0.051 376) 时, 我国对沿线国家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则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表 8 面板门槛值的估计结果

项目	上升期	下降期
门槛值	0.051 376	
$SOFDI_{it}$	2.167* (6.71)	-0.110** (0.81)
KL_{it}	-0.026* (-3.02)	-0.072* (-3.25)
KY_{it}	0.123* (7.11)	0.114** (2.30)
SD_{it}	-0.398* (-3.34)	0.036 (0.12)
OP_{it}	-0.066* (-5.23)	-0.010 (-0.26)
常数项	0.520* (39.81)	0.731* (9.59)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 (1)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现倒 U 型非线性关系, 影响机制为正的就业效应和负的技术效应。(2) 两者之间关系存在技术效应和就业效应的门槛特征, 在就业门槛条件下, O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间呈现 U 型关系, 只有就业效应水平达到一定的门槛值时, OFDI 才能显著地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 在技术门槛效应条件下,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出显著为正且边际递减的规律。(3)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使双方间倒 U 型非线性关系显著。(4) 考虑到地区差异, 我国东中部地区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 U 型非线性关系。(5)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寻求型 OFDI 与技术寻求型 OFDI 显著地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 而资源寻求型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则较弱。

本文结合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了以下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力度,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国内有能力的企业扩大对沿

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鼓励企业在当地设立研发、设计及高新技术创新基地,高效吸收国内人才集聚效应和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加速相关产业率先转型升级,从而提高我国劳动力的平均素质和劳动生产效率,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2) 培育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的提高会有利于企业的差异化发展,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能更好地吸收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其员工工作技能会得到提高,企业间的工资竞争效应也会开始凸显,从而促进当地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劳动收入份额提高。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围绕政府、协会、高校和企业,探索多层次、多主体和多模式创新体系,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准备社会基础与条件。(3) 由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投资动机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差异,相同投资动机 O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又存在投资区位差异性,因此政府在制定和落实投资策略时不能“一刀切”,应该根据投资动机、投资区位实施差异化投资管控机制。对资源寻求型 OFDI,应加大投资力度,向能源、基建、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扩大再投资,形成持续性的投资带动出口,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对沿线国家市场寻求型 OFDI,可利用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非生产性投资成本更低、周期更短等特点增加非生产性投资力度,降低“走出去”的成本和风险;对沿线国家技术寻求型 OFDI,应在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将学习、吸收和再创新相结合,增强我国自主创新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4)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类型国家市场发展成熟度和规范度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了投资阻碍与投资风险的差异性,使得我国 OFDI 存在明显的区域集中性。这种集中性投资会造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不利于我国 OFDI 的合理布局。因此,我国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尤为重要,政府应当通过建立高效便利的海外投融资体系降低投资成本和风险,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及法律支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从而带动我国国内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参考文献]

- [1] 白重恩,钱震杰.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 经济研究, 2009(3): 27-41.
- [2] 陈登科,陈诗一. 资本劳动相对价格、替代弹性与劳动收入份额[J]. 世界经济, 2018(12): 73-97.
- [3] 贾妮莎,雷宏振. 对外直接投资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J]. 国际经贸探索, 2017, 33(9): 86-98.
- [4] 李磊,白道欢,冼国明.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母国就业——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16, 51(8): 144-158.
- [5] 李梅,柳士昌.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 管理世界, 2012, 66(1): 21-32.
- [6] 李扬,殷剑峰.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 经济研究, 2007(6): 14-26.
- [7] 刘海云,石小霞.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部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1): 101-111.
- [8] 毛其淋,许家云.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员工收入[J]. 产业经济研究, 2014(6): 50-59.

- [9] 史恩义, 张瀚文. OFDI 动机、金融发展差异与出口贸易[J]. 世界经济研究, 2018(8): 74-87.
- [10] 王玉泽, 罗能生.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19(4): 1-12.
- [11] 阎虹戎, 洗国明.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够提高员工收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11): 93-103.
- [12] 周记顺, 万晶. 对发展中国家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探究——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20 个中低收入国家 OFDI 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20(4): 42-53.
- [13] ACEMOGLU D. Labor-and Capital-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 1(1): 1-37.
- [14] BENTOLILA S, SAINT-PAUL G. Explaining Movements in the Labor Share[J]. The B. 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3, 3(1): 1-33.
- [15] CUYVERS L, SOENG R. The Effects of Belgian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European High-wage and Low-wage Countries on Employment in Belgiu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2011, 32(3): 300-312.
- [16] DUNNING J H.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O, Wijkman P M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M]. London, Macmillan, 1977, 395-418.
- [17] FEENSTRA R C, HANSON G 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lative Wages: Evidence from Mexico's Maquiladora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42(3-4): 371-393.
- [18] GEISHECKER I, GÖR G H. Winners and Losers: A Micro-level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Wages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1): 243-270.
- [19] 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 93(2): 345-368.
- [20] HEAD K, RIES J. Offshore Production and Skill Upgrading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2, 58(1): 81-105.
- [21] HIJZEN A, GÖRG H, HINE R C.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the Skill Structure of Labour Demand in the United Kingdom[J]. 2005, 115(506): 860-878.
- [22] HUANG C H, TENG K F, TSAI P L. Inward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a Group of Middle-income Countries [J]. Global Economy Journal, 2016(3): 511-538.
- [23] IBARRA C A, ROS J. The Decline of the Labor Income Share in Mexico, 1990-2015 [J]. World Development, 2019(122): 570-584.
- [24] JAYADEV A. Capital Account Openness and the Labour Share of Income[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31(3): 67-98.
- [25] KALDOR 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echnical Progress—A Comment on Professor Hicks's Article[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61, 13(1): 1-4.
- [26] KANG M J. Th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rade Openness and FDI on Income Distribution[J].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Information Review, 2014(4): 151-167.
- [27] KARABARBOUNIS L, NEIMAN B.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9(1): 61-104.
- [28] NILSSON H K, HEYMAN F, SJÖHOLM F. Multinational Firms, Acquisitions and Job Task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4(66): 248-265.

Does OFDI Promote Share of Labor Income Growth in China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reshold Model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AN Jing, ZHOU Jishun

(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OFDI on labor income sha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DI and labor income share by using China's investment data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from 2003 to 2017.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DI and labor income share is inverted U-shaped nonlinear. When OFDI intensity is less than the threshold value, OFDI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ncrease of China's labor income share. On the contrary, OFDI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increase of labor income share in China. The Belt and Road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After further differentiating OFDI regions and OFDI motives, it reveals that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OFDI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of China, market OFDI and technology OFDI f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labor income share are more significant. The impact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OFDI has an impact on labor income share through positive employment effect and negative technology effect.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is used to further test the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y effect and employment effect. It is known that under the employment threshold con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DI and labor income share shows U-shaped nonlinear. Under the technology threshold effect, the effect of OFDI on labor income share presen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nd marginal diminishing characteristic.

Keywor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abor Income Sha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reshold Effect

(责任编辑: 武 齐)